

# 论荆楚文化对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影响

李学明, 王伟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利用考证、推理、演绎等研究手段, 研究荆楚文化的生成与变迁。受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形势、移民结构等的规定和影响, 荆楚文化有着独特的区域特征, 对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荆楚文化; 湖北; 辛亥革命; 影响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6121(2010)03-0124-04

文化是人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主动进行的物质创制与精神创制。荆楚文化的地域范畴大体与现今所说的长江中游地区相当。<sup>[1]</sup>荆楚文化是荆楚地区民众所创造的具有浓郁的地方特性的地域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中, 荆楚文化多被视为南方文化的代表; 在中国近代文化中居于先进地位, 备受世人瞩目。在荆楚文化的传承发展中不仅保留了原有的文化底蕴, 并且还以其沟通南北的地域之便不断地吸收与融汇异地文化因素。作为承南接北的地域文化, 荆楚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荆楚文化的独特个性为中华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对于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原因, 冯天瑜认为:

1. ‘种豆得瓜’的张之洞治鄂; 2. 前赴后继的湖北革命党人; 3. 清朝统治的薄弱一环。”<sup>[2]</sup>王天奖认为: “1. 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加深; 2. 封建剥削的空前加重; 3. 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4.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长。”<sup>[3]</sup>其他研究者也像冯天瑜、王天奖一样, 多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军事因素、社会因素去分析, 至于文化因素, 很少有人提到, 关于从区域文化角度分析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 更是鲜有人论述。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相互关联的普同性与特异性, 荆楚文化除了具备中国整体文化的“伦理类型、基本精神及主要特点等普同性”<sup>[4]</sup>之外, 也有自己的特异性。荆楚文化的生成与变迁, 受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形势、移民结构的规定和影响, 而每一种因素对文化影响的力度则因时因地而异。因此荆楚文化

有着独特的区域特征, 对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产生深刻的影响。

## 一、荆楚文化具有的取义成仁的爱国特性使湖北革命志士易于发动群众并掀起辛亥革命的阵阵浪潮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爱好和平、团结统一、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的伟大民族精神。而荆楚文化就是这种伟大民族精神的杰出典范, 具有“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怀乡恋乡的情结”, “这种情感, 在包括湖湘文化在内的楚人身上特别强烈、特别突出”, “爱国主义精神, 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切爱恋”<sup>[5]</sup>。以爱国精神为己任, 是古代楚国众多士大夫与贤臣所追求的人生理想, 也是荆楚文化重要特征的深厚底蕴。从古代的令尹子文、孙叔敖、屈原、王昭君, 到近现代的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 他们的爱国壮举体现出荆楚文化的深厚内涵, 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溢彩流华。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名言, 唱响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发展创新的历史进程, 成为许多仁人志士追求理想、改造人类、亲自实践的精神源泉。湖北地区是古代楚文化的主体区域, 它保留了比较多的楚文化因素, 湖北的近代文化除了拥有楚文化的精髓外, 也融进了近代的“救亡爱国”主题。

湖北的仁人志士在近代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 掀起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浪潮。1903年4月8日, 沙俄欲长期侵占东北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 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5月13日, “武昌学生尔时已感受新潮流, 不期而集议于曾公祠者千余人, 痛斥清政

**[收稿日期]** 2010-03-20

**[作者简介]** 李学明(1953-), 男, 上海人,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区域文化研究; 王伟(1972-), 男, 河南新蔡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黄淮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区域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 上海市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规划项目成果(SJ0703)

府辱国丧权。”<sup>[6]</sup>为了鼓动新军,刘敬庵、张难先等志士每周日都举行集会宣讲,内容“多根据孟子与王船山、黄宗羲诸家之说,阐发民族、民权思想,而亡国之痛实为人类最痛心之境,每每发挥无遗”<sup>[7]</sup>。这些宣传给“新进的同志启发很大”<sup>[8]</sup>。邓玉麟在军队中演说,“语尤沉痛,至扬州江阴嘉定之惨局,甲午庚子之耻辱,非革命不足以救国救种等语,泪随声下,闻者心动,各协、标、营踊跃入营者不下数千人”<sup>[9]</sup>。

## 二、荆楚文化具有的顽强拼搏的剽悍性使湖北革命志士不怕牺牲和敢于战斗

楚文化表现在气质性格方面,“突出地表现出火辣辣、热烘烘,敢斗,务实,正气凛然,好胜倔强的精神素质”。精神风貌方面,“荆楚民众既多幻想,激情浪漫;又很讲究正气,朴质实干。两者荟萃,刚柔相济,相得益彰”<sup>[10]</sup>。湖北人的总体性格古来就是“躁强”、“剽悍”、“劲悍”,《湖北通志》卷21开篇称:“荆狄之地也,圣人立,必后至;天子弱,必先乱”,“其人率多劲悍、决裂,盖天性然”,湖北人“不蔽人之善,不隐人之恶,则其质未始不甚良”。由此可知,湖北地区的士人从古代就有任侠的风尚。通观《湖北通志》,湖北地区的人们的群体性格比较强悍、劲直。例如,咸宁“咸宁境少沃野,人多劲悍决烈,其风斗狠僧越名分”;崇阳“旧俗尚器竞”,“近则秉性慕义,有先民遗风”;汉阳“民性劲直决裂,多存仁义”;黄安“民多犷悍而不驯”;宜城“其人劲悍”;枣阳“人性犷直”,“习尚器竞,闲不能免”,“风气犷悍,良莠不齐,非精明严肃之吏不能治”;公安“俗好鬼神,劲悍知职,负气”。

荆楚文化表现出的剽悍性孕育出湖北革命志士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1910年4月,群治学社遭到破坏,湖北志士不怕危险,重新振奋精神,决定成立振武学社,于1910年7月先开筹备会,会上由“李抱良报告经过情形”,“推杨王鹏起草简章,大体仍群治,惟组织标营队代表。”<sup>[11]</sup>1900年8月自立军起事失败后,清政府大搞白色恐怖。1902年春,吴禄贞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他不顾湖北当局的阻挠与威胁,“常向武昌有志青年灌输革命思想,使湖北革命思想日趋浓厚。”<sup>[12]</sup>1904年10月,华兴会长沙起义由于先期事泄而归于流产,黄兴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花园山机关的曹亚伯、金华祝、李步青不顾个人安危,不怕牺牲,积极帮助黄兴脱险。武昌起义命令下达后的当晚,刘复基、蒋翔武坚守指挥机关,为保护同志,刘劝其他同志先行离去,把危险留给了自己,为了革命宁愿牺牲自己,他告诉守候的潘公复“无须在此呆等,可速往巡道岭学社,那里地区稍偏,比较安全”,“我辈当此环境,固不可畏避,但为继续革命计,必不可聚在一处,让仇敌一网打尽,并且推潘下楼,潘始离去。”<sup>[13]</sup>

在文学社与共进会主要领导或死或逃的非常时刻,两湖志士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武昌首义立下了汗马功劳。1911年10月10日晚,在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武昌首义,文学社与共进会中的湖南志士起了重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李达武勇敢善战,每战必克。孙昌福则“与工程营会合,会攻军械库,充敢死队员,转战汉口、汉阳。”<sup>[14]</sup>,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 三、荆楚文化耻于张扬的隐秘性使湖北革命志士能够更好地搞好组织与宣传工作

荆楚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山川怪异,生活其间的人们容易产生奇特的幻觉、神秘的猜测、奇异的遐想,人与自然界似乎有一种微妙的关联。在古代时期,由于认识水平与技术条件的局限,人们难以将自己与自然界区分开来,因此也就“长期保持着神人交通的原始信仰,在这种原始精神支配下,楚文化呈现出诡异神奇的文化特征”<sup>[15]</sup>。巫覡通过卜问吉凶、治病疗疾及主持特定的祭祀等一系列神秘活动,确定了他们在荆楚地方社会中的地位。无论是人生仪礼还是岁时节日,人们都离不开神道与法术。历代的官宦、文士在他们的诗文中留下了不少记述这方面内容的文字。荆楚地区民众浓厚的鬼神信仰为巫覡的产生提供了丰沃的土壤,而巫覡的活跃又使民众中的神秘传统不断得到阐释与强化。在后楚时代的荆楚故地崇巫尚鬼、祀神重卜的风习常盛不衰。“巫覡文化在荆楚文化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因而使荆楚文化带有浓厚的神秘意味。”<sup>[16]</sup>历史上还有数次北方的移民以及明清时“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由于民族文化和移民文化的差异,主体文化在发展中对这些存在差异的少数民族文化和移民文化,不断地加以涵化和兼容。荆楚文化浓厚的神秘性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衍变为荆楚文化的隐秘性。在近代,关于湖北人的群体性格,范措曾经称赞道:“楚士多自潜修,耻尚夸耀,黯然而章,期合古道,声华标榜,未之前闻。”罗福惠认为,湖北士人“性格内向、耻于自我阐扬;不善交结、交流和授受”,“民俗士风多承袭传统的隐逸性格”<sup>[17]</sup>。

古人云:“事成于密,毁于随。”湖北革命志士受具有隐秘特性的荆楚文化的影响,讲究策略,注意隐蔽精干,秘密行动,有利于革命的组织与发动,从而有利于推动革命的成功。湖北军界秘密团体之组织,若雨后春笋之萌发,其中,主要团体有黄汉光复会、自治团、武德自治社、振武学社等,这些小团体少至十人,大到几十数百不等,其主要目标则是推翻清政府。湖北志士发展军队士兵采用了非常严格而又灵活的方法。注意秘密行动,从物色对象、个别谈话、填写愿书

到组织审查批准,每一步都严肃认真。群治学社会员万迪麻曾经回忆:“当时的‘愿书’并不是先印好的,而是各自用便条写好,经介绍人和负责审查的一、二同志看过后就予以销毁,防止因保管不善而暴露”。<sup>[18]</sup>振武学社根据实际情况秘密活动,完善了组织,一致决定,“凡干部会议非标代表不得参与,各营不得互知其内容,以防宣泄;惟承代表之命,分途进行,并传达命令而已”<sup>[19]</sup>。制定标营队排各代表负责公约、规程,重新制定简单口号以为志,以是部勒完整,进行益猛。”<sup>[20]</sup>这样,其组织“较前益加严密”。文学社还运用多种方式进行秘密联络,彭纪麟召集社员开会时,“总以研究学术为掩护。有时在酒保旁隙地,或体操房天桥下面露天举行,表面上是游戏活动”<sup>[21]</sup>。他们还经常以研究学术、交流知识为名,暗中拜盟换帖,以八人或十人为一班,以班联班,团结同志。湖北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也紧锣密鼓地开展新军工作。利用秘密社会组织,黄申芑在军队中“以联络帮会方式进行,先换帖拜把,逐渐灌输革命思想,直到填愿书入会为止”<sup>[22]</sup>。他和郭寄生还向新军面授联络的“诸种手势及问答语”,“彼此既确知为同志乃作交谈”<sup>[23]</sup>。共进会注意保密,也采用了标营代表制度,各标营之间“只有直的关系,并无横的联系(同单位的同级代表有一定的联系)”<sup>[24]</sup>。

#### 四、荆楚文化具有的实干性使湖北革命志士务求实效

楚人具有“筲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实干精神。周初楚君熊绎僻处荆山,“筲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昭公十二年);两周之际,楚君“若敖、冒筲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筲路,柴车;蓝缕,破旧衣服。“以处草莽”、“以启山林”,意思相同,都是讲楚君乘柴车,穿破旧衣服行藉礼,即举行春耕典礼仪式。这与周天子“冕而朱”和中原诸侯“冕而青”,穿着讲究的藉田典礼有别,不仅具有号召人民艰苦奋斗的意蕴,更有号召全国人民勤于耕种的实干精神。这种“筲路蓝缕”的艰苦创业就是实干精神的表现。这既是先秦楚民族的精神,也是荆楚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春秋中叶,称霸中原的楚庄王,常向国人“训之以若敖、冒筲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就是教育国人发扬艰苦创业的实干精神。秦汉文化一统整合后,楚人这种实干精神成为荆楚文化的一种优良传统精神。在湖北党人中并没有产生著名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但他们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即鄂省党人,耻声华,厌标榜,木呐质直。“尤其在近代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局势下,更加激发了荆楚人的这种精神。”<sup>[25]</sup>这些人于江南一些学校中“高谈革命,实

则于学理、时势,茫然十不知一,惟为新潮流所激励,似不谈革命不得谓文明也”<sup>[26]</sup>的浮薄青少年不同,他们不尚声华,注重实干,立志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并没有出现过特别显著著名的人物。但是,湖北的普通革命志士们,默默无闻地宣传、脚踏实地工作,临危受命进行大举,由于具有脚踏实地的实干性,楚文化影响、熏陶和浸润了这样的结果。1904年春,刘敬庵、曹亚伯、张难先等志士研究进行革命的方法,“皆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易发难”<sup>[27]</sup>,认为“要想运动军队,非亲身投入行伍不可”<sup>[28]</sup>。于是,张难先、刘敬庵都注重实践,参加军队。湖北革命志士不企求以轰轰烈烈的行为耸动视听,长期深入基层,张难先在工程营“散发《猛回头》、《黄帝魂》诸书以激励之”<sup>[29]</sup>,发动新军。湖北党人埋头苦干的精神,最突出地表现在他们艰苦深入地从事新军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上。鄂籍志士自新军编练之日起,就把目光投向了这支部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组织工作。1903年4月8日,沙俄欲长期侵占东北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当夜,朱和中、吕大森到吴禄贞住处晤谈,决定“一在武汉应设立秘密机关,律得与各地之同志联络”,“二为应将革命之同志,介绍入军界。”<sup>[30]</sup>后来,“由吴禄贞之介绍入营者,前后三十余人,均由予(指朱和中一引者)等所请求,且大半为秀才。”<sup>[31]</sup>至武昌首义之前,士兵参加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达五千多人,占了湖北新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还有大批士兵是同情革命的,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人”<sup>[32]</sup>。至此,湖北新军已经被改造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队伍,这些体现出湖北仁人志士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辛亥革命的胜利,与湖北志士十余年来辛苦的发动改造、注重实干有着密切关系。辛亥革命时期,鄂籍志士默默无闻地进行军队的发动和改造,在新军中不断地宣传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他们忍辱负重,发扬实干精神,投身行伍,运动新军,创造性地把军队体系和自创组织联合起来,将清政府赖以维持其统治秩序的军队变成了支持革命的力量。

#### 五、结语

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原因,以前研究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化观念对辛亥革命的影响,至于从区域文化特征加以深刻论述的论著更不多见。章开沅提出了“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强调不仅要注意人们历史活动背后的经济动因,也要注意到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社会诸要素,以至某些自然条件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即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素质以至民族心理、地理环境等许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我

们要注意人们历史活动背后的区域文化因素。<sup>[33]</sup>荆楚文化是荆楚人民在特定历史时空中创制出来的独特的地域文化,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民族文化的融汇与复合。这种南北文化的交流持续了数千年,每当中原出现变故,处于南北交接地带的首当其冲的荆楚地区就成为移民及移民文化荟萃之区,荆楚以其特有天然条件与开阔的胸襟接纳消融着四方文化。因此,荆楚文化具有爱国性、隐秘性、实干性、剽悍性,神秘浪漫。荆楚文化博大、诡异,生机勃勃。由于文化“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sup>[34]</sup>,因此,我们可以从区域文化影响的角度加以分析历史活动,可以看出荆楚文化对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积极影响与推动作用。

### [参考文献]

- [1]罗运环.论荆楚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特点[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2):194.
- [2]冯天瑜.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原因初探[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4):51—58.
- [3][26]王天奖.也谈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原因[J].江汉论坛,1980(4):66—70,71.
- [4]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0.
- [5]罗敏中.湖湘文化论集[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34—138.
- [6][13][30][31]朱和.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531—533.
- [7]曹亚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1)》[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578.
- [8][21]普祖较.辛亥首义回忆录(2)[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90.

- [9][29]湖北省博物馆等.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220,2.
- [10]巫瑞书.荆湘民间文学与楚文化[M].岳麓书社1996,324—325.
- [11]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湖北通志馆印[M],1947:11.
- [12]杜迈之.自立会史料集[M],岳麓书社,1983:221.
- [14]佚名.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M],湖北人民出版社,1951:4.
- [15][16]萧放.论荆楚文化的地域特性[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9,10.
- [17]罗福惠.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11.
- [18]吴剑杰.辛亥革命在湖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36.
- [19]张难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0—31.
- [20]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254.
- [22][23]江炳灵.辛亥首义回忆录(1)[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3、14.
- [24]郭寄生.辛亥首义回忆录(1)[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92.
- [25]罗运环.论荆楚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特点[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02):195.
- [27]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11.
- [28]蔡寄鸥.郑州血史[M].洛阳:龙门联合书局,1958:14.
- [32]万鸿阶.辛亥首义回忆录(1)[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121.
- [33]严昌洪.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社会[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12.
- [34]丹尼斯·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24.

[责任编辑]何春雨